

中外名人修养文库

ZHONGWAIMINGREN XUYANG WENKU

18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教育与科普研究所研究项目

中外名人修养文库

毕唐书 陶继新 主编

第 十 八 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佩尔蒂尼： 西方最得人心的政治家	1
苏哈托： 以“三不”人生哲学立命	10
附录：苏哈托自述（摘录）	18
林绍良（苏多诺·沙林）： 始于家族，超越家族	20
大松博文： 日本精神的化身	25
附录：魔鬼的自述（摘录）	39
盛田昭夫： 唯有创新才能生存	44
附录：日本·索尼·AKM（摘录）	47
李远哲： 父母的家教是促成我有今日成就的关键	49
基辛格： “单枪匹马”独往独来的美国牛仔	55
附录一：亨利·布兰登评基辛格	69

附录二：休·西德尼评基辛格	70
玛格丽特·撒切尔：	
对辱骂和攻讦无动于衷的“铁娘子”	71
哈桑二世：	
他选择了最艰难的路	82
附录：挑战（摘录）	87
李光耀：	
这是一位现代儒者	88
附录：李光耀《语录》（选四）	95
侯赛因：	
人生就是历险	97
胡安·卡洛斯一世：	
新西班牙的象征	106
苏菲娅·罗兰：	
家庭生活与事业各占我生命的一半	113
附录：我谁也不摹仿	122
曼德拉：	
斗争就是我的生命	125
附录：给女儿的信	134
唐纳德·特朗普：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同命运作斗争	136

佩尔蒂尼

西方最得人心的政治家

曾任意大利总统的山德罗·佩尔蒂尼是坚定的反法西斯老战士、意大利社会党元老，在国内国外颇有影响，是意大利和西方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酷爱自由，热爱意大利民族和意大利人民，一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反对法西斯而坚强奋斗，曾6次受审、多次坐牢，两次越狱，一生中竟有十几年是在狱中和流放之中度过的。他不屈不挠，为缔造意大利共和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978年，82岁的佩尔蒂尼被推选为意大利总统。他是品德完美、英勇无畏和对民主理想忠贞不渝的化身。他以人道主义为基点，一生关心和爱护底层人民，并不断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他以他崇高的人格、坚定的立场、执著的追求、宽广的胸怀和一颗慈善的爱心，赢得了意大利人民的拥戴，被称为“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

对民主理想忠贞不渝的社会党人

佩尔蒂尼信仰人道的改良社会主义，18岁时就加入了社会党。此后数十年间，他始终忠贞不渝地恪守着一个社会党人的民主理想原则，坚决从事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曾6次受审、两次越狱，出狱后又积极组织武装斗争，为推翻意大利法西斯的黑暗统治和建立共和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96年9月25日，佩尔蒂尼出生于意大利萨沃纳省斯泰拉镇。1919年他被选为斯泰拉的市会议员，初步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锐智头脑。从加入社会党后的第一天起，他就坚定地站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立场上。1925年5月25日，佩尔蒂尼因反对法西斯而被捕。从此开始了被捕、流亡、服刑和流放的不平凡的战斗生活。在受审时，佩尔蒂尼既不否认自己

的活动，也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在结束申辩时面向公众说：“出于我的这一强烈信念，我不仅准备再次进监狱，而且一旦需要，我还准备牺牲生命。”这是佩尔蒂尼多次受审的第一次，当时他只有29岁。法西斯头目对佩尔蒂尼恨之入骨，受审几天后，佩尔蒂尼被一群法西斯分子打了一顿。他遭受袭击的事如此之多，以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他多次被送往医院治疗。1926年12月21日，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佩尔蒂尼和他的老师图拉蒂一起流亡法国，开始了真正的流亡生活。他们的流亡生活是艰难的，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延续了3年多的时间。1927年9月14日，当他还在法国流亡时，意大利法庭第二次对他判刑，理由是他同图拉蒂一起逃亡国外。在尼斯，他企图帮助一批反法西斯的铁路工人和产业工人逃亡国外，被意大利警察发现，于1928年10月初被捕，受到了审判。审判之后，佩尔蒂尼又恢复了政治活动。他在戛纳、孟德里乌和曼括内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报告会，还组织了一次题为《梵蒂冈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大会，反对法西斯分子。1929年3月20日，佩尔蒂尼返回意大利。在途中，他同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他认为，必须把各方面力量集中起来，同社会党各小组取得联系，同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取得联系，重新提高他们的兴趣和热情，组织一个地下活动网，以反对法西斯。回意大利后他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在短短几星期内他的足迹遍及波伦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庞培、罗马、比萨等地。他有时住旅馆，有时仅仅在候车室里打个盹儿，在车站的厕所里刮刮胡子。1929年4月14日，佩尔蒂尼再次被捕，从他的口袋里仅搜到1200里拉、3.4瑞士法郎和一张从斯佩齐亚到罗马的三等火车票。他的口供很简单，承认“一向从事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活动，广泛进行了符合我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审讯在罗马进行，除了他本人外，佩尔蒂尼没有株连任何人。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对他进行了持续两个小时的审讯，最后判处他10年零9个月的监禁。佩尔蒂尼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态度轻松自然，就像对待与他本人无关的事一样。他巧妙地使法官们上了当。在法庭上他突然用全力喊出了“社会主义万岁”和“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并同企图阻止他的宪兵们搏斗，鼻子被打出了血。他回忆那段故事时说：“当时我只是这样想：‘现在是你尽义务的时候了，尽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的义务。’”佩尔蒂尼被投进了监狱，那时他刚满33岁，正是热爱自由的年纪，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在圣斯特凡诺服刑。那是全意大利最苦的监狱之一，牢房十分狭小，活动困难，通过漏斗形小窗户勉强可以看到一线天空。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顺风时偶尔可以听到渔夫的谈话声和大海的浪涛声。佩尔蒂尼在这样的斗室里开始了为个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后来他回忆说：“闹钟响了，已是黎明。从海上传来一串情歌，可以听到远处文托泰内的钟声在响。我抬头看看，天空万里无云，比任何时候都要晴朗。一阵突然吹来的风带来了夜间开放的鲜花的香气。春天来到了。这些声音，风的香气和晴朗的天空使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再次倒在床上，在这四壁之间浪费青春年华的惋惜心情痛苦地折磨着我，刺痛了我的心……”为此，他下决心再次行动起来。他用冷水洗了脸，接着就开始了日常工作：整理床铺、打扫牢房、做早操、看书学习。

在图里监狱，他与共产党人葛兰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葛兰西提出希望他加入共产党时，他说：“尽管我在萨沃纳一向同共产党人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感到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开展的斗争具有吸引力，但我还是不同意。我要继续留在我的党内，留在图拉蒂和特雷韦斯的党内，留在我青年时代的老师阿德里基·巴拉托诺的党内。”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佩尔蒂尼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榜样。皮亚诺萨监狱是佩尔蒂尼在法西斯监狱中旅行的第三站，那时他还不到36岁。他当时患有右肺炎，经常发烧，头上还有一个伤疤——那是法西斯分子殴打的纪念。他的病历上还写着：“狂热的颠覆分子，要严加看守。”

佩尔蒂尼第一次受审是在萨沃纳，第二次是因为同图拉蒂一起外逃，第三次是因为在法国的埃什设立无线电台，第四次是在特别法庭。1937年9月21日，佩尔蒂尼在波尔托费拉伊奥再次被送上了法庭。

佩尔蒂尼在监狱中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和评论性的书籍。他读过蒙塔莱、波特莱尔、魏尔伦和兰波等人的诗作，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法朗士和马尔罗的小说。他被莫拉维亚的小说《冷漠的人》深深地打动了，因为莫拉维亚的作品能在到处欢庆胜利的时代揭露一个社会和阶级的阴暗面。

当佩尔蒂尼再次被流放时已经44岁了，44年中他竟有11年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到1943年，佩尔蒂尼将近47岁了，坐牢和流放却已经14年，还不算流亡国外的那几年时间。

在科利埃皇后监狱里，佩尔蒂尼表现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过着最平静的生活。他很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他的囚衣的裤线永远是笔直的。每天晚上，他都小心翼翼地把裤子折叠起来，放在草垫子底下。他的脸经常刮得很干净。他表现得异常镇定自若，给了战友们以极大的鼓舞。

1947年，佩尔蒂尼同南尼在罗马相会。在罗马他同南尼和萨拉盖特一起组织了社会党的第一届执委会，担负起组织军队的任务，并共同研究成立反德武装力量。

佩尔蒂尼是个具有强烈反叛性格的人，但他却一直是个守纪律的社会党党员。在80余年的生涯中，他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而饱受折磨和痛苦，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他是那样执著、坚强、勇敢，以至于受到了全意大利人民的拥戴。1978年他当选为总统并不是偶然的。

一位极富人情味的总统

山德罗·佩尔蒂尼身为意大利总统，在国内外声望日隆，然而他并不是那类冷若冰霜、残酷无情的政治家。他热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爱一切人。他以一颗真诚的爱心，感染了所有有良心的意大利人。

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佩尔蒂尼在远离家乡的萨沃纳定居下来，但并没有中断同家人的密切联系，也没有中断同自己的家乡斯泰拉镇的联系。他和他的哥哥——职业军人朱塞佩是很好的朋友，曾经在一起共同作过战。朱塞佩因为参加过战争而受到人们的凌辱，一怒之下加入了黑衫党，这使得他们兄弟俩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然而，当佩尔蒂尼被法西斯分子流放到圣斯特凡去服无期徒刑时，朱塞佩毅然退出了法西斯党，并在49岁时忧郁而死。为此佩尔蒂尼痛心地说：“我从未想到过他会这样死去！……我感到伤心的是没有来得及同他和好！”

佩尔蒂尼十分爱他的母亲。然而由于斗争的艰苦和长期的被囚和流放，他们母子俩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但这并没有减弱他对母亲的爱。他在科埃利皇后监狱服刑时，曾写给母亲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面前放着你最近的来信，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妈妈，你不应该如此气馁。我非常理解你是多么痛苦，但你也不应该沮丧和绝望。当你悲伤的时候，离开斯泰拉的孤独生活去萨沃纳走走，去找找能够安慰你的

知心朋友。有了你们的关怀我不再感到孤独。……使我唯一感到悲伤的是我如此热爱的你们还在为我受苦受难。……妈妈，请经常给我来信，因为你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我们已经进入了阴云密布的季节，请多多保重。……妈妈，紧紧地拥抱你……”

1941年，佩尔蒂尼在流放中得知母亲的健康状况恶化，他十分担心。他小心地研究母亲给他的信中的书法和用词造句，从中发现句法不连贯，似乎是在头脑不清醒时写的，字迹也不如过去那样工整、规范和苍劲有力。当他想到白发苍苍的母亲以颤抖的手写那封信时，他读着读着就流下了眼泪。为了能够同母亲见上一面，他违背初衷，向法西斯内政部申请把他押往萨沃纳监狱住几天。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母亲。后来，他以沉痛的心情回忆当时的经历说：“我觉得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老多了：矮小的身材穿着黑衣，脸色灰白，白发苍苍。我拥抱了她。她哭着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我控制着自己，不让看守发现任何软弱的表示。……然而，我的心难受极了，好像被撕碎了一样。……我看着母亲弯着腰慢慢地走出去。我回到牢房后便倒在床上不想吃饭。我思绪起伏，总离不开母亲。”他自己承认说：“我非常爱我的母亲，要是我知道她奄奄一息，无论相隔多远一定会跑回家去。”然而岁月无情，母亲还是去世了。从那以后，他一直怀念着母亲。1960年，佩尔蒂尼回到斯泰拉度假时，在教堂里见到了一个跪凳，那是他母亲生前祈祷时常用的，一向从不徇私利的佩尔蒂尼这一次却一反惯例，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弄到手，拿回家去作纪念。

佩尔蒂尼对父亲也怀着深沉的爱。虽然父子俩在政治信仰上有隔阂，然而他对父亲的爱却是始终如一的。父亲死后，佩尔蒂尼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怀念：“我……从学校回家过复活节，我一个人站在可怜的卧病在床的爸爸身边。我记得他面黄肌瘦，但他那双和蔼可亲的眼睛里仍然充满着生活的希望和温柔。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微笑着用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语调说：‘好样的，山德罗！我听说你考了第一名，我非常高兴，继续努力吧！’我默默地听着，流着眼泪看着爸爸。他的目光多么慈祥，他的脸色多么苍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的脸色，他的目光，他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回忆和景象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切。这就是我现在的记忆。妈妈，如果爸爸还活着，

我仍然站在他的身边……他还会像那时一样对我说：‘好样的，山德罗！我为你感到高兴，继续努力吧！’我可以肯定爸爸一定会这样说的。这样的信念就足以弥补我所受的微不足道的痛苦，鼓励我沿着正确的道路坚持下去。”

当佩尔蒂尼得知他的哥哥被纳粹分子残害在弗洛森堡集中营时，他动情地大哭了一场。以后他主动要求同哥哥的遗孀玛丽亚·佩德罗和侄女米莉通信，并热诚地帮助她们。他最亲爱的弟弟欧金尼奥也是被法西斯分子杀害的。后来佩尔蒂尼访问西德时到了弗洛森堡——他的弟弟就是在那儿被杀害的。他在焚尸炉牢房里立了块纪念碑，在那个阴暗的斗室里呆了半个多小时，像孩子一样放声痛哭，哀悼弟弟和所有惨遭不幸的人们。

佩尔蒂尼极重友情。在普利亚的图里监狱里，他与共产党人葛兰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仍然坦诚相待。葛兰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在智慧上是悲观主义者，但在意志上是乐观主义者。”佩尔蒂尼认为是真理。当佩尔蒂尼得到葛兰西去世的消息后，用被子蒙上头大哭了一场。佩尔蒂尼与他的老师图拉蒂之间的友情也是很深的。他们的友谊是在流亡中建立的。1932年3月29日图拉蒂去世后，佩尔蒂尼在监狱里面对墙壁躺在草垫子上，一整天没有吃饭。若干年后，佩尔蒂尼重游图里监狱，他的心情分外激动。他让其他人离开，自己在那里单独呆了一段时间。

佩尔蒂尼对共和国元老阿门多拉与乌戈·拉马尔法的友情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们不属于同一党派，政见分歧很大，但他们仍然相互信任，有着深厚的友情。多年后，阿门多拉病危，但他仍带病投票选举了佩尔蒂尼就任共和国总统。拉马尔法也投了他的票。后来，死神降临到这两位共和国创始人身上时，佩尔蒂尼尽最大努力去向他们告别。当拉马尔法病危时，他一直在医院守护，并且睡在那里。他说：“我非常爱他们，我爱阿门多拉和乌戈·拉马尔法就像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佩尔蒂尼对另一位共和国创始人南尼也始终怀着尊敬之情。南尼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你干得很好。你正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山德罗，继续这样干下去，我非常支持你。”佩尔蒂尼把这封信珍藏起来，常拿出来读一读。他说：“当别人对我不理解时，这封信对我是一个安慰。”

总之，佩尔蒂尼是个人情味十足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国外赢得了广泛的拥护。

“我要永远不疲倦地反对战争”

佩尔蒂尼 1982 年访问日本时曾说过：“我要永远不疲倦地反对战争。”的确，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站在一个正直的社会党人的立场上，与法西斯分子以及一切好战分子作坚决的斗争。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这一立场。

佩尔蒂尼年轻时曾经是个中立主义者，但不久他就走上了反战的道路。在热那亚大学法律系读一年级时，意大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学们在校园高呼万岁，他却高呼“打倒战争”，为此受到别人的冷落，失去了不少同学的友谊。战争发起时，也毫无例外地冲击到了佩尔蒂尼，他被应征入伍，作为汽车司机到了都灵的第 25 炮兵队。虽然他当时是个中立主义者、颠覆分子、社会党人，但他照样参加了战争，而且真正地打了仗。他在伊松佐河地区和巴图西扎高原作过战，亲眼看到自己排里的士兵纷纷阵亡，“我看到他们倒了下去，我像失去亲兄弟那样为他们而悲泣。”退伍后，参战的人受到了人们的鄙视。然而佩尔蒂尼既不抱怨别人，也丝毫没有感到失望，只是对战争的厌恶在他心灵深处更牢固地扎下了根。他回到斯泰拉，很快脱掉军装。他不愿穿着军官服四处炫耀，他认为参战是他的耻辱。他谴责暴力行动，曾告诫青年人说：“你们不要使用暴力来表明你们的理由和意见是压不倒的。你们不要武装你们的双手，而要武装你们的头脑，使自由具有可靠的基础。”他还说：“我从跨进青年时代起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反对法西斯的立场。诚然，我意识到这将会使我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还是采取了这一立场。”他曾因为散发地下印刷的题为《在法西斯的野蛮统治下》的传单，反对战争，而于 1925 年 5 月第一次被捕。1929 年，他再次被捕入狱后，官方的档案认为他“是极端危险的人物，狂热的反法西斯分子，敢于进行轻率的犯罪活动。请全力进行监视、调查和跟踪。”从此后，法西斯分子对佩尔蒂尼的追查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佩尔蒂尼一生的斗争过程，始终与反对战争紧密相联。他始终认为战争是“愚蠢的事”、军备竞赛是“自杀”。在当选总统以后的几年中，他反

复强调：“我向你们重申我曾说过的那句简单的话：‘腾空武库，填满粮仓。’”

“国家第一职员”

1978年，80余岁的佩尔蒂尼当选为意大利总统。作为政治家，佩尔蒂尼不嗜好权力。他从未当过部长，虽然他想当个部长是极其容易的。他喜欢称自己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认为“这是我的力量所在，但也是我许多灾难的源泉”。他对于共和国及其弊病持十分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不谋私利，就任总统后，还常到多年前自己购买的一套42平方米的住房里去休假，且喜欢自称“国家第一职员”。他在党内从来就不是达官显贵，也从未拉帮结派。虽然他自夸是自主派，甚至是比南尼还坚定的自主派，但他没有建立过任何派别。他曾说：“大多数人认为，在政治上不能讲良心，所以政治家有一种道德标准，私人交往中又有另一种道德标准。对我来说，道德标准只有一个：谁在政治生活中是无耻之徒，在私人交往中也是无耻之徒。”他反对腐败堕落，反对对错误的事情保持缄默。他从来就是个诚实的人，他搞政治从来都是两袖清风。他是一个能够体现集体情感的人，他的主导思想在于维护自由、社会正义和公民与当局的正确关系，关心青年的前途和和平。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爱意大利，爱意大利人民。他认为意大利人民是善良的、宽宏大量的人民。他信任意大利人民，也信任年轻的一代。他对青年人充满了信心。他自己就是一个“老青年”。1979年他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会见。这是两位“老青年”的会见。会见结束时，他指着铁托说：“我们并不老，只是年纪大一些。”因德罗·蒙塔纳利在评价佩尔蒂尼时，认为他是个能够仅以个人的纯洁心灵进入当权派的行列，保持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努力纯洁当权派队伍，并打乱他们那种黑社会秩序的人物。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西方最得人心的政治家

佩尔蒂尼是个人道主义者，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他不信教，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却能容忍别人信教。当他发怒时在言辞上伤害了别人，

他总是后悔不已。他说：“我可以说我是没有过错的，我的狂暴始终是言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我从来没有动过手、打过架。我曾经挨过法西斯分子的不少棍棒，但我从来不用棍棒还手。我认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出现狂暴的时候是正当的。对于错误的事情，一个有信仰的人应该猛烈地去谴责它。但当我遇到这种情况后，我总会感到遗憾。当我独自一人，自己不能对自己撒谎时，总是自言自语地说：‘糟糕，我对那位同志，对那位同事发了火，我做得很不好。今天我请他们喝咖啡，想办法请他们原谅我。’我是人，除我自己外，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我不知道大儒主义是什么货色。也许正因为这点，我才不是个好的政治家。”

佩尔蒂尼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但他认为他从来没有犯过背弃自由和民主的错误。他认为这是他的骄傲！他是酷爱自由的，他一生为了自由而奋斗，从未放弃过。他说：“失去自由之时便是丧失一切之日”，由此可见他对自由的推崇！

佩尔蒂尼同情下层劳动群众。他永远站在工人阶级的一边。他同工人的结合是相互的，他尊重工人们。他曾说：“不管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还是在暴风雨中，青年人都应该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他不认为干体力活有失知识分子的身分。在流亡期间，他曾当过汽车清洁工和泥瓦匠小工。在法国尼斯流亡的几年中，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全都是低下的工作。1928年他在电影中扮演过群众角色、建筑画匠和装饰匠。曾有一张他当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骨瘦如柴，身穿工作服，头戴报纸折叠的帽子。他早年当斯泰拉社会党市议员时，曾尽一切可能为穷人撑腰。1926年夏，他被法西斯分子殴打成重伤，警察拘留了其中一名肇事者。但当他了解到这是个因饥饿所迫而投靠法西斯分子的失业工人时，他原谅了他，没有向法院提出起诉。

佩尔蒂尼是一个十分关心社会民生的人。早在他任斯泰拉社会党市议员时，虽然他不主管该市的水道、老年人的安置等社会问题，但他仍然对此十分关注。当他担任总统后，尽管意大利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利有限，但他仍然四处奔波，事必躬亲，被意大利报刊称为“干预主义总统”。

佩尔蒂尼一生都颂扬人的尊严，颂扬每个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他认为他个人的自由和对手的自由，也就是所有人的自由。他认为自由首先意味着颂扬个人的尊严。他在总结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说：“如果命运的奇迹使

我重生，我将以同样的信仰、意志和心情重新走上 20 岁时我在萨沃纳走上的道路，尽管我知道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如我已经付出的代价那样。这样，当我的生命即将结束回首往事时，我会感到没有虚度一生。”他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也同样珍惜别人的自由。他性情爽快，说干就干。他出于他那一代许多社会党人所建立的道德规范，从未搞过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

“和蔼可亲”、“廉洁诚实”、“言行一致”是人们对佩尔蒂尼的第一个评价。他曾经说：“我为自己的言行一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连我的对手也不否认我的这个品德。”

佩尔蒂尼的文化修养是很高的，主要喜爱古典文学，但对当代的东西也极其注意。他安详、自信，是个真正有风度的人，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他曾因为不想与其他人的不忠实同流合污而决定离开众院，提出辞职。他一贯认为，身居一定地位的人必须自己付出代价，决不能用别人的责任去为自己辩解。

佩尔蒂尼是这样一位普通然而伟大的总统，他为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尽了自己的一切职责。他是个努力保持永远正直的正直人。

1981 年 4 月初，有名望的英语杂志《经济学家》称佩尔蒂尼为西方最得人心的政治家，是对佩尔蒂尼一生公正的评价。

苏哈托

以“三不”人生哲学立命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两位总统。一位是被誉为印尼“独立之父”的苏加诺，一位就是苏哈托。这两位总统在性格和作风上有天壤之别，在事业的成就上也各不相同。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达 21 年之久，他才华横溢，性格活跃，喜欢引起政治上的轰动效应，却不注重踏踏实实的经济建设。他为印尼赢得了独立和世界影响，但却留下了

政治上的动乱和经济上的贫困。苏哈托担任总统长达20余年，在其总统生涯中，没有苏加诺那样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场面。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不甚活跃，一直取低姿态。他集中全力埋头搞经济建设，虽然没有震撼全世界的政治上的轰动，但他却为印度尼西亚带来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

1968年苏哈托刚刚登上总统宝座时，他所面对的是苏加诺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对外，债台高筑；内部，通货膨胀。对此，苏哈托把它比作是吃“西马拉卡马”恶果。这是一个古马来语的说法：“如果吃下这种恶果，你的父亲将会死掉；而不吃呢，你的母亲将会死掉。”但是，经过20年左右的苦心经营，苏哈托所领导的印尼吃下了这颗“恶果”，却避免了灾难。20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印尼生产了2020万吨大米，比1970年增加了50%。那一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为9.6%，超过了预计的7%，被列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1984年印尼完成了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实现了粮食自给，挤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苏哈托还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特别邀请，在南—北对话中作为南方国家的代表介绍了增加农业生产的经验，并于1986年7月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1989年，由于印度尼西亚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苏哈托又被邀请到纽约再次接受联合国的嘉奖。现在，印尼的工农业取得了稳步发展，国民人均收入已由1965年的90美元上升到了现在的近500美元。苏哈托声称：“20世纪末以前的5个五年建设计划，都是在机场上打基础，一进入21世纪，印尼的工业就要像努山塔拉制造的‘神鹰’那样，离地腾飞而起。”

做为总统，1988年苏哈托再次被印尼人民协商会议推选担任这一职位，这是他自1968年以来第5次蝉联该职，到1993年期满，他作为总统的政治生命已经超过了赫赫有名的苏加诺。但他与苏加诺不同，苏加诺为终身总统，苏哈托却已明确表示不当终身总统。

作为一个平民和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作为一个东方贫困落后国家的领导人，苏哈托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引人注目的。考察他的全部经历，探讨他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他的修身追求以及基于这一基础的他的性格和作风，是促使他事业成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以“三不”人生哲学立命

苏哈托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他曾说过：“我的根子在农村。”

1921年6月8日他出生在印尼中爪哇名城日惹西郊的克穆苏村。父亲是一位农村公务员，负责农村饮用水的管理工作。母亲生下他不到40天就得了重病，不得不把他交给接生婆克罗莫奶奶抚养。苏哈托因此对克罗莫奶奶的疼爱终生不忘。

苏哈托8岁的时候，父亲把他寄放到了姑姑家里。姑父是乌扬托罗地区的农业官员，苏哈托在那里开始上小学。姑父还亲自种了三块试验田，苏哈托放学后便干农活，生活在农民中间，又从姑父那里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有时搞种植试验比赛，他种的洋葱和大蒜总是最好的。农村的生活给予了他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便同情农民，具备了农家的思想感情。姑姑和姑父还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带苏哈托到清真寺去学习经文。苏哈托后来也成了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与此有很大关系。

苏哈托的姑夫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十分注意对他进行身心修养方面的训练，每到星期一、四，就强迫他睡到屋外房檐下去，以培养他的吃苦精神。

爪哇是印度尼西亚古老文明的发祥地，那里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深远，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哲理深入人心。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爪哇的生活方式对苏哈托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很早就懂得了爪哇的“三不”人生哲学。所谓“三不”，就是不惊骇、不惊奇、不骄矜。苏哈托以此修身立命，后来在面对安危的所有危急关头，他都以此激励自己。

苏哈托艰苦地读完了小学，由于家境困难，父亲和姑父都没有经济能力再供他上学。父亲内疚地对他说：“孩子，只能到此为止了。望你自己挣钱，然后再继续求学吧！”

自己挣钱，并非易事。苏哈托在家乡到处奔走，却四处碰壁。最后，只得再去求姑父帮助，在乌扬托罗的一家农村银行当了个助理职员。他十分珍惜这一工作，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刻苦学习银行簿记。从事这一工作使苏哈托发现了自己的长处：脑子比较灵，于是增强了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勇气。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使苏哈托丢掉了这只饭碗，也改变了他的命运。银行的职员要求穿戴整齐，而苏哈托的衣服太旧了。他向大妈借了一条新筒裙，由于不小心，新筒裙被自行车破垫上的弹簧勾破了一个口子，银行以穿戴不整为由，把他解职了。

苏哈托于是来到梭罗找工作，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应征入伍，在荷兰皇家海军当兵。后来上司让他当军炊，他不想干，又离开了海军。但苏哈托并不灰心丧气，再次去登记应征，进入了荷兰东印度皇家陆军，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荷军向日军投降，苏哈托担心被日军逮捕，便跑到芝麻墟，换上了便衣，乘火车直奔日惹，又到了乌扬托罗。由于疟疾复发，他整整躺了6个月。躲过风声后，他先登记当警察，后来又加入了日本人成立的、由印尼人参加的军队组织“卫国军”。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后不久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苏加诺担任了总统。但荷、英盟军以胜利者自居，试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1947年到1948年，荷兰向年轻的印尼共和国发动了两次侵略行动。1948年12月19日，荷军突然向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发起进攻，并把军队开到了市内。当时苏哈托已是共和国军队的中校。清晨，他在睡梦中被炸弹惊醒。在寡不敌众、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率领所部撤向郊区。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当地农民的热情欢迎。苏哈托和接待他的村长相处得也很融洽。他穿着短裤和衬衫，和村长一样出没在田间和市场上。

为了驳斥荷兰人的造谣污蔑，向全世界显示印尼人民的力量，苏哈托经过精心的策划，决定于1949年3月1日向驻扎在日惹的荷军发动一次总攻击。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当时，一切准备就绪，不料一位营长没有注意到1949年是闰年，2月份有29天，错把2月29日当成了3月1日，因而提前24小时对敌开了火。这个过早的行动本来破坏了整个部署，但却意外地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一阵枪响之后，苏哈托并没有陷入慌乱，而是仍然按兵不动。荷军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骚乱，以致3月1日开始的正式总攻，他们也没有引起注意，因而反抗不力。苏哈托斗志昂扬，带领士兵冲进日惹市中心，占领了“瓦特森”兵工厂，缴获了5吨弹药和轻武器，一辆坦克也被缴获。中午时分，他们迅速撤离，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等荷兰的范·郎恩上校找来援军时，印尼军